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今天的课堂，教师们都在“走钢丝”——AI 浪潮下全球高等教育的困境、反思与重构

■郭英剑

近千年来,大学经历过无数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变革都会改变知识传播方式,但很少真正改变大学存在的意义。不过,如今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却第一次让大学不得不重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果知识能由机器即时生成,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近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了一篇题为《随着人工智能进入课堂,教授们正走在钢丝上》的文章。作者贝丝·麦克默特里将如今大学教师的处境形容为“走钢丝”,即一边担心学生越来越依赖 AI,一边又不得不承认 AI 已成为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工具。

事实上,这不仅是美国大学面对的问题,也是全球大学共同面对的新课题。无论身处哪个文化语境,大学教师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当学生能在 3 秒钟内得到一篇结构完整、措辞流畅的文章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坐下来慢慢写?

一场已经发生的 AI 革命

当代人大概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AI 进入大学课堂已不是即将到来的革命,而是已经发生的革命。

从 2023 年开始,全球的大学生都在将生成式 AI 工具纳入日常学习流程。这一现象在全球各大学中几乎同步发生,速度之快让大多数高校的管理层和教师群体措手不及。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学生并非都出于懒惰或投机。大量学生,特别是非母语环境下的留学生、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第一代大学生,以及承受工作与学业压力的成年学生,都将 AI 视为一种平衡工具,让他们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得以喘息。面对这些学生,我们是否还能简单地将“使用 AI”定义为学术不诚信?

同时,大学的教师和管理层也在飞速分化。有些大学迅速出台禁令,将 AI 工具的使用纳入学术不端。有些大学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将“AI 素养”列为毕业核心能力,要求所有课程融入 AI 工具。更多的大学则陷入困惑:政策滞后,规定模糊,教师各自为政,学生左右为难。这种混乱正是这场革命尚未找到方向的真实写照。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我的共鸣,是因为其触及了一个大多数教育文件都没有直面的问题——AI 的挑战根本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教育哲学问题。

长期以来,大学评价体系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之上:学生独立完成的作业是衡量其学习成果的主要证明。论文、报告、家庭作业被视为衡量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一面镜子。但当 AI 能在几秒钟内生成一篇言之有物的学术论文时,这面“镜子”就失去了反射功能。教师们开始意识到,他们长期用来评估学生的工具已悄悄失效。

这就迫使教师必须追问几个此前从未认真追问过的问题。

首先,我们布置作业究竟是为了让学生“产出”什么,还是为了让他们“经历”什么?一篇 5 页的分析文章,其价值是那 5 页纸,还是学生在查阅资料、整理思路、反复修改过程中的认知变化?如果是后者,当 AI 代替学生完成了那 5 页纸后,学生究竟失去了什么?



中国大学评论破“五唯”,教师“多维”评价须回归价值理性

■宣华萍 樊秀斌

2020 年以来,我国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提出要破除“五唯”顽疾,探索多维评价。但实践中,很多教师都感到,目前开展的“多维”评价不仅仍存在“五唯”问题,甚至某些高校“五唯”指标的内涵反而被扩展且更“唯数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关部门没有认识到高校教师工作的高度主体创造性,只采取简单量化指标计量的考核方法。这不仅很难科学反映科教工作及成果的实际水平和贡献,还会导致教师陷入比拼量化指标数量的“内卷”中。

当前,高校教师的“多维”评价看似多元和灵活,但其依赖“量化指标”的行政管理逻辑并未改变,反而增加了评价指标和数量的要求,导致教师不堪重负。

一是导致教师专业精力分散。“多维”的本意是多元包容、分类发展,让拥有不同特长的教师各有赛道,但当前的“多维”评价实行“积分累加制”,要求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都有产出,将“单项赛”变成了“全能赛”。这既不符合教师专业发展规律,也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二是导致教师学术追求异化。量化

无论身处哪个文化语境,大学教师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当学生能在 3 秒钟内得到一篇结构完整、措辞流畅的文章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坐下来慢慢写?



其次,何种能力是 AI 替代不了的?或者说,何种能力是我们希望大学生通过反复练习建立起来的,以至于即便 AI 能提供捷径,我们也坚持要求学生走那条更慢、更费力的路?

最后,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否预设了学生只有在“没有 AI”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如果是,当 AI 无处不在,课程设计是否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其本身已标志着一种重要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从“如何防止学生使用 AI 作弊”的防御姿态,转向“如何重新设计教学,使 AI 不再构成威胁”的建设姿态。

全球课堂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 AI 时代这场没有剧本的教学实验中,全球的大学教师已摸索出若干值得关注的路径。

一是从“产品评价”转向“过程评价”。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在课堂内布置写作任务,而非将作业留在课后。课堂限时写作、分步骤提交草稿、公开展示写作过程,这些方式虽然增加了教学负担,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评价逻辑。教师考查的不再是学生“写了什么”,而是“如何形成这些想法”。

二是将 AI 变成研究对象而非研究工具。一些教师尝试让学生使用 AI 生成初步答案,并要求学生分析答案的错误、偏见、遗漏和盲点。这种“解剖 AI”的教学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还帮助其建立起对技术的审慎态度。

三是重新激活口头表达与现场思维。目前,AI 还无法在现场讨论中替代一个人当场作答、即席辩驳。因此,许多教师开始大幅增加课堂讨论、口头答辩、小组汇报的比重。这不仅是一种反 AI 策略,更是对长期被论文评价体系压抑的口头思维能力的重新重视。

四是建立更精细的 AI 使用规范而非“一刀切”式禁止。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完全禁止 AI”和“完全放开 AI”都不是最佳答案。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在课程层面建立分层规范——哪些任务能用 AI 辅助,哪些任务必须独立完成,使用 AI 时需标注哪些内容。这种分层管理不仅更接近学生在未来职业环境中的真实情境,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技术的自主判断能力,而非简单的服从或规避。

这些变化并非来自某个顶层设计,而是来自无数教师在实践中的摸索与反思。它们的共同方向是将教学重心从知识的“传递与检验”转向思维的“生成与培育”。

在改变教学方法的同时,AI 也在悄悄重塑师生间的权力关系和信任基础。

在传统大学课堂,教师是知识权威,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这种关系建立在一个明确的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教师知道,学生不知道;教师出题,学生答题。但当学生能通过 AI 即时获取大量信息,甚至能用 AI 检验教师讲授内容的准确性时,这种结构便发生了根本性松动。

对教师来说,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解放。所谓挑战,源于教师不能再仅凭“我知道,你不知道”维系课堂权威,他们需要更真实的智识魅力、更深刻的问题意识、更丰富的现场引导赢得学生信任。AI 时代,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快失去存在价值。

所谓解放,源于当信息传递工作可部分外包给 AI,教师终于有机会从繁琐的知识灌输中解脱出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提出好问题、激发真讨论、陪伴学生经历困惑期等。这些恰是 AI 目前做不到的。

同时,师生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面临新压力。教师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们很难确认学生提交的作业是否出自学生本人。这种不确定性有时会营造一种相互猜疑的氛围,即教师将每份作业都视为潜在的 AI 产物,学生担心任何流畅的表达都会被怀疑。这种氛围对教育本应具备的信任底色是一种严重侵蚀。

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的不是更严格的检测工具,而是更根本的教学关系重建——当评价方式从“检查学生有无作弊”转向“真正了解学生在想什么”,当师生间的互动从“提交—批改”转向“对话—反馈”,信任危机才可能真正化解。

“走钢丝”没有退路

所有这些变化最终都指向一个深层问题:大学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 AI 出现前并非没有争议。有批评者早已指出,现代大学的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文凭生产系统”,学生来到大学并非为了智识成长,而是为了获得一张通往职场入场券。在此逻辑下,课程是路径,作业是任务,成绩是货币,毕业是终点。

然而,AI 的出现以一种极端方式把这个问题置于明处——如果大学只是培养完成任务的能力,AI 完全能取代这种培养;如果大学的使命比这更深远,那么这个使命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大学有过不同回答。中世纪大学强调神学与哲学的真理探索;启蒙时代的大学强调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培育;现代研究型大学强调知识创造与专业训练;通识教育改革则侧重培育具备跨学科视

野的公民素养。这些目标并不互相排斥,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

面对 AI,我们或许需要重新确认一个大学教育最难被替代也最值得坚守的核心使命,即培养一个人在面对复杂、不确定、充满价值冲突的情境时独立思考、作出判断、承担责任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能通过记忆知识或完成作业获得,甚至不能通过阅读教材获得。它是通过一次次真实的思维遭遇——被一个好问题击中、在激烈辩论中被迫重新审视立场、在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面前独自承担判断的重量而逐渐形成的。

AI 能短时间生成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但无法替代学生在课堂上意识到自身理解有错误的那一刻所感受到的智识震动,也无法替代其因此而发生的真实改变。这才是大学教育真正的产品。

因此,大学教育目标的重构不是简单地“加入 AI 课程”或“培养 AI 素养”,而是要在 AI 能轻易完成大量认知任务的今天,更清晰、更坚定地回答:有哪些人类心智的生长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外包的?有哪些关于价值、判断、责任的问题是机器永远无法替我们承担的?

麦克默特里将大学教师的处境比作“走钢丝”,这个比喻之所以准确,不只因为左右为难,更因为没有退路。无论教师是否愿意,脚下的钢丝已经架起,没有回头路。

对全球大学而言,这意味着至少 3 个层面的转变。在制度层面,大学需要建立更灵活、更精细的 AI 使用政策,根据课程目标、学习阶段、学科特性作出有依据的差异化规定。同时,学术诚信的定义也需要更新;在 AI 普遍存在的世界,“独立完成”与“合理辅助”需要被重新界定,并以学生能理解和遵循的方式传达。

在课程层面,大学需要重新审视现有课程的设计,识别哪些课程目标依然成立,哪些需要调整,哪些则已经失效,需要被替代。这不是一次性的课程改革,而是持续、动态的调整,需要教师群体建立新的专业发展机制。

在教学文化层面,大学要从根本上重新确认,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输出,而在于过程;学生的成长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而在于形成何种思维;教师的价值不在于传递信息与知识,而在于激发真实的思考、见证真实的成长、培育真实的人格。

“走钢丝”的人必须保持动态平衡,不能因为害怕跌倒而止步,也不能因为急于到达终点而忽略脚下。对大学教师而言,这种平衡正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教育示范——在不确定中保持判断,在变化中坚守价值,在新技术面前不失对人的信心。

大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与时代对话的历史。它曾经在印刷术的冲击下重生,在启蒙运动的洗礼中蜕变,在工业革命的重压下转型。每一次,都有人预言大学将走向终结,但每一次,大学都以新方式确认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今天,面对生成式 AI 的挑战,我相信大学最终也将找到新平衡——不是通过拒绝技术,也不是通过拥抱技术,而是通过重新回答那个永恒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6 年毕业典礼上,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三次重要的人生选择——从商海诱惑转向科研坚守,从普林斯顿大学全职回归清华,再从清华辞职全力创办西湖大学。

施一公的演讲坦诚并充满力量,尤其是他谈到创办西湖大学的初心,对于理解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个人选择到教育创新

对于为何要创办西湖大学,施一公的回答并不复杂。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探索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新路径、新做法。西湖大学不是对既有大学体系的简单复制,而是希望成为中国高教改革的“特种兵”和“尖刀排”,在体制机制、学术治理、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如果放在经典理论中理解,施一公创办西湖大学的意义可回应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关于企业家重要性的论述。

熊彼特曾强调,企业家的核心功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生产资料来源或新组织形态推动创新。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灵魂”,企业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突破既有路径,将原本分散的要素重新组织起来,形成新的发展可能。

由此来看,施一公创办西湖大学并非简单地新建一所高校,而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尝试一种新制度组合和资源配置方式——把高水平科学家群体、社会捐赠、地方政府支持、现代大学治理、基础研究使命以及“小而精”的办学定位结合起来,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路径。

从民办教育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施一公的经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国内民办高校创办者复杂而多元的办学动机。

长期以来,似乎一提到民办教育,公众就容易将其与资本、营利、市场化等概念直接相连。不可否认,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确有部分举办者较多地从产业投资的角度办学,但也必须看到,还有相当一批创办者并不以经济回报为主要诉求,而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服务社会。比如,浙江大学学院创办者王家扬、西安培华学院创办者姜维之等,都可视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公益情怀和教育理想的代表性人物。

施一公在演讲中反复谈到“忠于内心”“高点求变”和“小我与大我融合”,这不仅是他个人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也可以看作中国民办教育家群体的一种精神写照。

从高校数量到教育多样性

当然,民办高校不是同一种模式。有的学校从职业教育切入,服务地方产业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有的学校从国际化教育切入,探索开放办学;也有像西湖大学这样的高校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入手,尝试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领域作出原创性贡献。

正是因为民办学校的资源条件和创办者的办学理念不同,民办高等教育才呈现出多种可能性。而中国高等教育当前最缺少的恰恰是多样性,尤其是那些区别于现有研究型高校办学模式的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

过去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持续提升,一批大学已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的行列。但与此同时,大学发展模式仍然存在趋同倾向。很多学校追求相似的指标、相似的学科布局、相似的人才评价方式和相似的发展路径。

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显著、产业结构复杂的大国而言,只有少数几种大学模式是不够的。中国既需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既需要应用型本科高校,也需要职业本科高校;既需要大而全的大学,也需要小而精、专而深、机制灵活的大学;既需要公办高校,也需要民办高校。

从高校数量与人口规模的关系看,我国高教机构的布局与数量仍有扩展空间。截至今年 6 月 17 日,我国共有高校 3196 所,其中普通高校 2952 所,包括本科学校 1412 所、高职(专科)学校 1540 所;2025 年末,全国总人口约为 14.05 亿人。如果按全部高校 3196 所作粗略计算,我国约每 43.96 万人拥有一所高校;如果按普通高校 2952 所计算,则约每 47.59 万人拥有一所普通高校。

再看美国和日本。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21—2022 学年,美国有 3542 所招收一年级本科生的学历授予型高等教育机构;美国人口在 2025 年约为 3.42 亿,约每 9.65 万人就拥有一家此类高等教育机构。

日本方面,该国留学官方信息平台显示,日本有 86 所国立大学、101 所公立大学和 620 所私立本科层次大学,合计 807 所;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 10 月 1 日日本总人口为 1.23 亿人。粗略计算,约每 15.34 万

施一公为何创办西湖大学……民办高等教育的典型「样本」

■王一涛

人拥有一所本科层次大学。

当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上述比较只能作为粗略参照。但即便如此,这组数据仍然提示我们——当下我国高校数量并不能简单说“已经太多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高校数量多少,而在于高校类型是否足够丰富、空间布局是否合理、办学模式是否多样、教育评价能否支持不同高校各展其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湖大学的创办特别有价值——它不是在传统赛道上增加一名竞争者,而是尝试开辟一条新的赛道。

施一公提到,西湖大学成立不到 10 年,已经汇聚近 300 位优秀科学家,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这些成绩说明,一所机制灵活、定位清晰、使命坚定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自己的学术能量和社会影响。

从单一评价到制度包容

对于西湖大学这样的新型高校,社会需要更多耐心,政府也需要给予更多制度空间。

西湖大学的发展道路不同于普通研究型大学,也不同于传统民办本科高校。它的办学规模相对较小,学科布局并不追求大而全,人才培养模式也不一定完全适配常规评价框架。如果仍简单套用传统高校的评价标准,就可能削弱这类学校的制度创新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用一种标准评价所有高校。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职业本科高校、职业专科学校、新型研究型大学所承担的功能不同、发展基础不同、组织形态不同,评价标准也应有所差异。

具体而言,对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以更多考察其基础研究、学科体系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对应用型高校,应重点关注其服务区域产业、产教融合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对职业本科高校,应关注其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技术技能人才和产业适配度;对西湖大学这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则应更多关注其制度创新、学术原创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评价标准一旦过于单一,就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让新型高校在早期探索阶段承受不必要的制度压力;二是诱导所有高校向同一种模式靠拢,形成“千校一面”。

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鲍威尔与保罗·迪马吉奥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制度同形”理论,指出组织往往会在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压力下逐渐趋同。就高等教育而言,这 3 种压力共同作用于高校发展。但其中与审批、评估、资源配置和政策问责相联系的强制性压力往往具有更直接的塑造力。

事实上,越是新型高校,越需要一定的办学自主权。自主权不是不要监管,而是在依法办学、规范治理、公益导向和质量保障的前提下,允许学校在学科布局、人才引进、教师评价等各方面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西湖大学的启示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不能只依靠一种大学形态、一种评价标准和一条发展道路。民办高校也绝非公办高校的简单数量补充。对于这样的探索,社会应给予更多理解,政府应给予更多制度空间。不同类型的大学各安其位,各展其长,中国高等教育才会拥有更加广阔的未来。

(作者系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民办教育分类管理视域下的举办者行为规制研究〈AFA220024〉成果之一)